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SSN 2097-2628, CN 10-1877/A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一个国外学者的视角  
作者： 薄国强，张家玮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6-03  
引用格式： 薄国强，张家玮.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一个国外学者的视角[J/OL].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877.A.20260603.1110.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一个国外学者的视角\*

[澳]薄国强/文 张家玮/译

**[内容提要]**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从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看，这一研究有着广泛的制度背景。以 2005 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育改革为界，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05 年是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国学者的主要特征是“谨慎的旁观者”，他们撰写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介绍与综述。2005 年至今的 20 年是研究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成为自信的参与者，他们聚焦核心议题、现实需求、问题导向开展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明确评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一种合理发展形态，但它终究是主流之外的一条支流。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国学者 接受史 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薄国强 (Roland Boer)，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张家玮，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40 多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不断发展，展现出从“谨慎的旁观者”到“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参与者”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所有的类似研究一样，并非只是顶尖学者的个人成果。这一研究及其成就是中国教育重大发展的结果，而教育发展本身又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涉及的学术研究评价都是笔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的分析，为方便行文，下文不再一一提及“中国学者”。

## 一、制度背景：从“异端”到“分支”

从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看，这一研究有着广泛的制度背景。2005 年，中国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这一新学科的二级学科。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学界显著增强。

### 1.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号召，这一思想解放的浪潮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久之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了。该书系统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 原稿系作者提供，译文有删减。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异同比较研究”（22AWTJ20）的阶段性成果。

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随后，学界意识到有必要深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得知徐崇温已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后，不少单位邀请他作一些报告。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性认识迅速提高，促成了徐崇温的早期研究成果出版，也促成了徐崇温本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一项临时的政治任务”到“一个长期的研究兴趣”的转变<sup>①</sup>。

鉴于出版年代及其需求，徐崇温仍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框架（通常称为“教科书体系”）内呈现相关内容，但这项研究及后续成果最终带来了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认知方式的“巨变”。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被断然否定，而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家族”中一个合理的分支，尽管它始终只是分支，绝非主干。

## 2. 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阶段划分

结合更广泛的制度背景，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中国学术研究中一种独特的子类型：综述研究。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中，笔者关注到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以2005年教育改革为界，将研究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

具体来说，第一个阶段始于1982年徐崇温的初步介绍，持续20年左右。起初，研究的争论焦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的科学发展路径，还是非科学的、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因而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著作的持续译介，以及对相关学者的专题研究日益增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普遍接受为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中的一种合理表现形式。

第二个阶段涵盖20多年，标志着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评价发生了质的转变。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学者们开始重新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析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谨慎态度截然不同，那时的评价仍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而如今，这一评价建立在40年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中国学者也凭借其深入的研究具备了全面的理论自信。

## 3. 关键转折：2005年的教育改革

两个阶段的转折点是2005年的教育改革。在改革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下辖多个子学科。在此部分，笔者将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相关要点。

在教育改革之前，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开展了约20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教育改革也是对既存现实的认可和正式化。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研究往往聚焦于地理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少关注。在教育改革中，新设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

<sup>①</sup>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徐崇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二级学科则将研究视野拓宽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四个研究重点的第三个<sup>①</sup>。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和教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完整课程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研究质量显著提升,并成功地拓宽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正是由于这些原因,2005年教育改革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后两个主要阶段的转折点。

在这一部分,笔者强调了政策与制度背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的重要性。不同于西方的学科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是孤军奋战;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就笔者的个人经验而言,研究者身边有许多同事共享相同的研究与教学框架。这种环境使得不少学者能够将职业生涯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有些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似乎略高。但这些评价必须放在特定历史性语境中理解,即彼时仍存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认为其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学者的立场正是对这种观念的回应。

## 二、谨慎的旁观者:对个别学者的介绍与研究

前文已述,以2005年教育改革为分界,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20年左右(两个阶段存在部分重叠),这期间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了质的转变。笔者将对最初20年的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探讨,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持谨慎态度的学者多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个体展开引介与专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存在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异端”还是应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发展的激烈争论。因此,早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带有观望者的谨慎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阶段,中国学者有一种明显的“学徒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彼时中国相对欠发达的经济(同现在相比),文化自信的缺乏,以及中国学术话语相对弱势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个别学者的著作介绍与研究。比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y Lukács)、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的核心著作被越来越多地翻译成中文。现在来看,这一

---

<sup>①</sup> 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78/A22/s7065/201410/t20141021\\_178219.html](http://www.moe.gov.cn/s78/A22/s7065/201410/t20141021_178219.html)。

研究阶段是必要的，因为它促成了中国学者从批判到接受、从否定到借鉴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在最初的 20 年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被视为“经典”（classical）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如预期的那样，关于卢卡奇的研究层出不穷，因为他常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稍后会回到这一问题，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续发展产生的所谓影响，视为一个孤立个案（即不具有普遍性影响）。换言之，只有将这部著作与卢卡奇的整体思想、成书的政治发展背景割裂开来，才能认为这部著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所谓的影响。

另有学者致力于介绍和推广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首先，关注的是葛兰西。例如，研究葛兰西在下述领域中的深刻洞见：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重大变革中的作用、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进步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相关问题等。其次，还有一些学者关注阿尔都塞，尽管这类研究往往会以一些批评收尾，但它们仍主要起到介绍相关问题的作用。例如研究青年阿尔都塞的哲学发展，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他对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ous）领域的区分——在这些领域中，经济基础在“最终意义上”（last instance）具有决定性。再次，我们也能看到关于列斐伏尔、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的研究，尤其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一些学者认为她对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发展提供了一些见解。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也关注那些被认为在方法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但不能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这种关注可以被视为中国学者对西方更广泛的“左翼”思想家著作的研究意愿。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被认为具有一定前景。此外，受到关注的还有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艾瑞克·弗洛姆（Eric Fromm）、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sup>①</sup>。

### 三、全球参与者：核心议题、现实需求与问题导向研究

当我们开始考察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阶段时，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开始显现。第一，中国内部的议题正日益影响着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互动（尽管这种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性影响）。第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语境和内在局限的批判达到了新的深度。这种批判，与最初的否定以及 20

---

<sup>①</sup> 论述涉及这些思想家的研究超出了本文范围，故不一一引述。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争论截然不同。彼时，否定和批判是由从苏联传承下来的“教科书体系”决定的，而非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背景的深入研究。第三，1989 年东欧剧变后，研究发生了质的转变，这种转变最初因事态发展的迅速而表现得有些模糊。在这一部分，笔者将论述第一个发展特征，具体来说即核心议题、现实需求与问题导向研究。

尽管关于阶级、物化、空间分析、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持续出现，但最显著的发展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生态学、正义以及随之兴起的政治哲学兴趣上。笔者将从以上最显著发展的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 1. 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简要地论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的研究，以及他们长期忽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未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任何质的改变有关，这种失败导致他们转向文化（上层建筑）分析，并脱离了工人阶级乃至共产党。不过，近年来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这一回归与当前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失败相关联，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

在此，笔者想比较两项有趣的研究，一项是十多年前的，另一项是较新的。十多年前，有中国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政治经济学重燃兴趣初期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分散和碎片化，每个学者或小团体都在推广自己的理论变体。近十年来，有其他中国学者注意到国外政治经济学（其范围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对大量国际资料的研究，中国学者指出，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然脱离纯粹的理论争论，转而日益关注现实问题，对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展开更深刻的批判——尤其是这些问题在 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后已愈发凸显；同时，学界对反抗策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也日益受到重视。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采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而非聚焦于某一特定方面，即系统把握帝国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生态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乃至数字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唯有如此，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次的系统性危机，进而把握彼时已然显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衰落及其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的本质。

### 2.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

在这一阶段，两个主要的问题导向研究议题是生态学和正义。这些议题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引发的。具体而言，彼时存在两大矛盾：一是自然环境的污染与退化，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与主要位于西部山区和边境地区、仍处在绝对和相对贫困的偏远区域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

解决第一个矛盾的方案就体现在“生态文明”这一表述中。“生态文明”涉

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全面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文明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在研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国学者始于 20 年前。起初的研究焦点集中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但中国学者也指出其存在的局限：一方面，该书提出的建议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另一方面，它在强调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生态洞见不足”这一问题时，缺乏辩证的视角。后来，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部分研究的关注对象，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 20 世纪 90 年代略带乌托邦色彩的戴维·佩珀（David Pepper）。

然而，最多的关注集中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著作上。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笔记，这些笔记近年来已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sup>2</sup>）项目中出版。中国学界对福斯特的研究成果认可度颇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于福斯特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史料依据。由此可见，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阐释生态问题、需要外界予以修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生态洞见不足”），不如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相关研究史料。对于一些中国学者而言，福斯特的研究范式是贯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这种辩证法将自然与历史维度有机融合，他甚至进而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而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指引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在诸多方面，学者们认为福斯特的早期主张对中国解决环境问题有所裨益，而近年来，其研究更是为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生态实践提供了理论启发，甚至构成了重要的学理佐证<sup>①</sup>。现在，福斯特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道路，并观察到其正在产生显著成果，他的言下之意是：社会主义确实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福斯特对恩格斯的重视所蕴含的意义，也已受到关注。他是倡导“回归”恩格斯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回归”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然，这种“回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特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举动便是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割裂开来，将“歪曲”和“背叛”马克思的责任归咎于恩格斯。中国学者陈先达多年前将这种错误做法称为“被肢解的马克思”，笔者最近则称之为“被截断的马克思主义”（truncated Marxism）<sup>②</sup>。相比之下，福斯特认为，恩格斯“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明”这一论点，反映了其“深刻的辩证分析与生态分析”，用“当今的话说”可以表述为“生态学是辩证法的证明——这一命题的意义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否认”<sup>③</sup>。而在一则

---

① 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的早期著作也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批判，被认为过于聚焦单一议题，未能充分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在人与自然环境复杂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局限。

② 参见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参见 Roland Boer. “A Truncated Marxism: On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Western Marxism”,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o. 2, 2023a, pp. 145-170.

③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Engels”, *Monthly Review*, Vol. 68, No. 10, 2017, p.49.

无意中呼应了中国对“生态文明”理解的论述中，福斯特指出，“对恩格斯而言，与马克思一样，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以一种尽可能促进人的潜能发挥、同时保障后代需求的方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the metabolism of humanity and nature）进行合理地调节”<sup>①</sup>，这对中国学者具有重要启示。尽管偶尔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涉及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但中国的主流观点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构成一个全面的方法论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都为此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换言之，中国学者大多赞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价值。

过渡到正义问题，我们可以将中国对“生态文明”的强调，以及时下流行的政策表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视为一种特定而具体的正义形式——生态正义的体现。

### 3.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

公平正义问题是中国过去十年的一个“热点话题”。本部分的重点是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互动。这涉及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西方著作。彼时的背景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出版，该书引发了最初的研究热潮，直至今日仍持续吸引着中国学者的关注<sup>②</sup>。然而，大量争论围绕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与艾伦·伍德（Allen Wood）的假说展开，即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观点主要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他写道：“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sup>③</sup>

基于这一文本中关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交易相适应、相一致的就是‘正义的’（gerecht）”这一观点，伍德特别断言，这体现了马克思的正义观。然而，事实上伍德等人混淆了“正义的”（just）与“正义”（justice）的多重内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使用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可能具有司法（法律）层面的含义（如上述引文所体现的）、价值层面的含义（即何为公正或公平），以及一种可称为“制度性”（systemic）的含义，即与特定制度相适配的含义（这也是上述马克思文本

---

<sup>①</sup>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Engels”, *Monthly Review*, Vol. 68, No. 10, 2017, p.50.

<sup>②</sup> 这种关注不仅源于该著作的重要性，也因罗尔斯受到其他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批判。尽管罗尔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分歧，但学界也关注其部分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之处，并认可罗尔斯后来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审慎探讨。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79 页。

引述的核心要点)。中国学者对此多有回应，试图通过详尽的文本诠释、哲学辨析与语言分析进行反驳。

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互动而言，中国学者关注了随后关于正义问题的内部争论。他们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构建正义理论的尝试，与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争论存在相似之处：一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正义概念引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另一部分则致力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挖掘相关理论资源。例如，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的《马克思与正义》便是针对伍德的观点做出的回应，该书试图将马克思早期对异化的道德谴责延伸至其后期的著作，并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寻找正义的评判标准。关注这场论争的中国学者指出，伍德、布坎南（以及塔克尔）陷入了由其研究语境引发的问题之中，而且他们倾向于“选择性摘取”（cherry-pick）符合自身论点的文本，进而割裂和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整体的历史和辩证法框架<sup>①</sup>。

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对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这些争论的整体评价是：它们反映并受制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其结果是，这些争论不仅可能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历史辩证法，还往往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与学术争论层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地，几乎缺乏实践性思考。结合前文关于中国学者重新关注正义问题的背景论述，笔者认为恰恰需要解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 4.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对生态学和正义问题的关注带来的一个最终结果是，学者们更广泛地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一议题的研究背景也具有重要性：一是改革开放特定阶段产生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二是在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及法治和法律体系得到了显著加强和完善。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各个流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试图构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同时也探寻这些学派在正义、权利等规范性问题上的观点。

与此同时，学界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何半个世纪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同当下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政治哲学与正义问题产生研究兴趣？而时至今日，西方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度为何又相对低迷？西方马克思主义彼时的研究成果，暴露了其自身的一系列固有问题：研究方法上重视单一问题分析、轻视整体性的研究；在理论建构中频繁引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这类引入虽可能具备一定的建设性意义，却也易引发理论的偏差；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相关理论主张，还呈现出难以避免的多元性特征。从这一视角出发，我

---

<sup>①</sup> 当然，除伍德、布坎南（以及塔克尔）之外，20 世纪 70—80 年代的这场争论还涉及其他学者。关于齐亚德·胡萨米（Ziyad Husami）、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凯·尼尔森（Kai Neilsen）等学者在正义及道德问题上的观点，中国学者对其也予以关注和评析。

们可以回到前文所述的研究背景，即探析中国学界为何会先对正义问题、继而 对政治哲学问题产生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简言之，中国学者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 早期的相关论争中汲取了研究启示，明确了值得深耕的问题域与需要规避的理论 误区；同时，中国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也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与长足推进。

在这一部分，笔者探讨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出现的四个核心议题，这些议题还 涉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关论述的探究，即政治经济学、生态学、正义与政治 哲学。尽管中国学者一方面欢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一 方面也对半个世纪前关于正义与政治哲学的材料进行了分析，但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浓厚的兴趣、最多的探讨和追问，都集中在生 态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益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福斯 特）已与中国学者展开了交流；而在此领域，中国学者还能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 具体实践经验，推动这一核心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 四、重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在最后一部分中，笔者将论述中国学者眼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局限性。从表 面上看，过去十年间更为尖锐的批评，似乎回归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及更早时 期）那种基于教科书的否定态度；但从深层来看，事实绝非如此——相反，这些 批判以及对其重大局限性的揭示，源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和整体性的研 究。接下来，笔者将指出中国学者的三个主要批判观点，而后重点探讨中国哲学 家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终结。

##### 1. 深度失衡、多元性与“乌托邦色彩”

第一个批判可称之为“深度失衡”（imbalanced profundity）。这不仅是由于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退缩至大学，并形成了晦涩的写作风格<sup>①</sup>，更重要的是由于其 抽象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其偏离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行动指南的初衷。换言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常常将理论与实践割裂，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特质。

第二个批判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纯粹多元性（the sheer plurality）。 无论是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评价中，还是在特定议题的研究中，多元性 问题都经常被提及。这种多元性的发展虽是一个持续过程，但也会呈爆发式显现， 出现一系列新的观点。往往可见的是，似乎每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提出 一个新颖的观点，或抓住最新的流行话题以崭露头角。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带 来了一个特殊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特征的学者。相 关批判观点认为，“多元化倾向”（pluralistic tendency）始终存在否定和歪曲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风险。另有观点将这种理论的持续多变、“理论时尚化”

---

<sup>①</sup> 中国学者的这一观点，也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多年前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西 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中所指出的那样。

(theoretical fashions)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虽然有学者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批判的价值，但另有学者认为这种批判相当不足。这里的关键在于，只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变化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才能对其形成深刻理解；而这里所说的更广阔的语境，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特有的那种曲折起伏、繁荣与萧条。当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局限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进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如何成为行动指南这一关键维度。

第三个批判是“乌托邦色彩”(utopian hue)。这一批判同前两个批判具有相关性，即深度失衡(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和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影响下的纯粹多元性，导致了所谓的“乌托邦色彩”。不足为奇的是，一些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齐泽克、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一度回归基督教起源，以寻找一种新的、颇具乌托邦色彩的“革命”形式和“共产主义理想”。

##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

笔者所探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问题，还带有一层个人学术研究的关联<sup>①</sup>。因为笔者此前曾专门考察过一个观点，即卢卡奇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尤其是他1923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的研究尤为全面。

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西欧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围绕俄国革命产生的早期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差异：一方面是“正统”(orthodox)马克思主义，其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些国家正走在艰难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另一方面是“西方”(Western)马克思主义，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态度，始终在批判性介入与彻底否定之间摇摆。

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关注那些被认为对后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体系作出初步贡献的思想家。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初出版于1923年，1930年又推出修订版，这部著作不时被提及，但卢卡奇才是一直被关注的核心。更具体地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直是关注的中心，这部著作收录了一些早期文章，即他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的初期完成的一些文章。该著作1923年首次以德文出版，之后多次重印，且每次都附有作者对这部早期不成熟作品的自我批评的序言。从对这部著作的最早研究开始，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其思想和政治发展背景割裂开来，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到70年代更为明显)，将这部著作视

---

<sup>①</sup> 参见 Roland Boer. “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 On the Unravelling of an Ideological Structure”, *Fud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o. 2, 2023, pp. 124-125.

为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某种基础。

第二，随着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他旅居苏联期间），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日渐成熟，他经历了一个自我批评的过程。基于这一过程，他进而否认自己在任何意义上参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路线的创立。例如，1938年，卢卡奇批判了自己早期作品中残余的唯心主义、对无产阶级主客体统一性中主体性的片面强调，以及未能认识到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此外，他开始对自己的早期作品进行自我批评。在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印本序言中，卢卡奇指出，这本书促成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的理论的倾向”<sup>①</sup>。在《生命纪录》(*Record of a Life*)中，他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存在的“根本的本体论的错误”(the fundamental ontological error)，是仅仅承认“社会中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sup>②</sup>。他不成熟地否定辩证法，否定劳动在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贡献，这也意味着卢卡奇那时完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认识。因此，卢卡奇指出“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sup>③</sup>，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正是“那些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被割裂出来，并被宣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

### 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还有一个方面，中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存在着一场引人入胜的争论。持“终结”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1968年西方学生抗议以及阿尔都塞和阿多诺的著作而终结。与这一主张相关，一些学者还试图将20世纪20年代初至1968年这一时期描述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这应当是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对象。因此，此后大量新的“流派”不应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尽管有个别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虽已发生转变，但并未终结，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学者为确定“终结”所作出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这一主张和随之而来的争论表明，学者们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质的变化发生在1989年之后，而非1968年。原因何在？首先，从时间上看，这场争论发生在1989年之后，可以被视为学者们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正在发生的质的变化的一种早期（尽管可能存在偏差）的认知。其次，这场争论事实上也涉及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它在1989年之后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也并非在1968年后。“后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大量新的主张和“流派”，许多“流派”在这一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争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

---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页。

② 参见中译本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李渚青、莫立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③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页。

间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女性主义、种族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后殖民批评与后现代批评等）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被抛弃，例如阶级理论、价值规律，甚至包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重要性也被抛弃。

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者事实上是在试图理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影响，但一些学者仍倾向于将“终结”定位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经典”时期的结束。从诸多方面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辨别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的质变的本质还是为时尚早，因为许多相关研究都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才完成的。在笔者看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前十年才是一个危机悬而未决的时期。“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原则的抛弃、工人阶级组织的瓦解，以及打着“共产主义”幌子的反动转向，都是这一悬而未决的危机的表现。当这场悬而未决的时期结束后，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牵涉冷战的批判，往往是尖锐、发人深省的，并且这些批评开始增多。

## 五、结论：作为主流的一条支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总而言之，笔者在本文中概述了中国学者和哲学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接受过程。首先，笔者强调了过去 40 多年这类研究的更广泛背景，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徐崇温 1982 年的初步研究得以出现并产生重大影响。2005 年教育改革是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彼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其子学科获得了政府和有关机构大力支持，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子学科）。鉴于笔者提出以教育改革为关键节点，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划分为两个 20 年阶段，本文的其余部分对其发展进行了阐述。起初，笔者相对简要地论述了最初的 20 年，彼时中国学者倾向于作为谨慎的旁观者开展研究，撰写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介绍和综述。2005 年之后，更具重要性的研究内容开始涌现。笔者将其分为政治经济学、生态学、正义和政治哲学等核心议题，并基于当前中国学者深入且全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试图辨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成分，找寻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互鉴模式，并摒弃其中为数不少的糟粕。

在结论中，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何以能够从第一个阶段的“学徒心态”转向第二个阶段的“自信参与”？答案始于研究的深化。随着学者们的研究日益深入和全面，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估也变得更加深刻和全面。然而，这一发展只有在其他一些因素的背景下才成为可能。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层面的，即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基础显著改善。第二个方面是更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教育和研究资源提供了保障；换言之，这为 2005 年的教育改革以及后续越来越多研究基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方面可称为“学术自信”，这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基于上述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日益增强，并推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从“谨慎的旁观者”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参与者”。

其次，还有三个相关的问题。中国学者如何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处于什么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具有何种作用？看到关于“如何定义”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中国学者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地理概念，还是意识形态立场？答案并非二者择一，而是兼而有之：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地理上产生和发展于世界上少数西方国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sup>①</sup>。这种意识形态性质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就优势而言，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锋芒（包括不接受任何正统观念），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的意识。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其产生最初的兴趣，正是因为希望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及其已察觉到的局限性，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学界已开始重新评估教科书的價值，以及对这类著作的新形式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许多劣势：包括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相疏离、与整个主流马克思主义传统相疏离，以及（明确或隐晦地）在冷战中站队。这些劣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它所秉持的立场与主流相悖。

再次，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强调，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发展，但绝不是主流。要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就必须承认、认可并进一步发展整个传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存在截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倾向，其往往只聚焦马克思本人，否定恩格斯及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视为这一主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被称作一条支流，但绝非主流。那么，什么是主流呢？初步答案是，它涵盖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所有发展（也包括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这一发展历程历经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的实践，再到从毛泽东直至今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主流的任务便是根据具体的判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此应当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流之外的一条支流，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

<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偶尔会有中国学者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却忽视了其地理问题。

<sup>②</sup>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主流的一条支流，是笔者对中国学术界发展现状的理解。中国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张翼星在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内在关系时指出：“列宁主义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般派别，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和基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则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支流和侧面。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中，主流与支流是不可分离的。”（参见张翼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

最后，我们回顾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特别是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其研究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自信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产物，是“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亦是一个更为宏大整体中的一环。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够吸收借鉴其他理论的精华，同时也能保持着清醒的科学思维，不断致力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同时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被视为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潮发展动态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袁蓓）

## Western Marxist Studies in China: A Foreign Scholar's Perspective

Roland Boer

Chinese scholars hav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Marxism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Tracing its origins, this research is embedded in a broad institutional context. Marked by the 2005 educational reform that established Marxist theory as a distinct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phases. The initial phase (early 1980s to 2005) was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acting as “wary onlookers”, who primarily produced introductions to and surveys of Western Marxist thinkers. The second phase (2005 to the present) has seen scholars evolve into increasingly confident participants on the world stage, focusing on core issues, realistic demands, and problem-based research. Through in-depth investigations, they have clearly assessed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Research in this phase embodies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onclusion, while Western Marxism may be regarded as a legitimat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in a capitalist context, it remains ultimately a tributary of the mainstream.